

光武韬略

钮岱峰

主编

昆仑出版社

开创盛世的帝王谋略

张红旗 程军 编著



开创盛世的帝王谋略丛书·钮岱峰主编

光 武 韬 略

张红旗 程军 编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武韬略 / 张红旗、程军编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1
(开创盛世的帝王谋略 / 钟巖峰主编)
ISBN 7 - 80040 - 681 - 4
I. 光... II. ①张... ②程... III. 光武帝 - 政治 - 谋略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9349 号

书名：光武韬略

编 著：张红旗 程 军
责任编辑：张俊南
装帧设计：许向群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www.jfjwypb.com
E-mail：jfjwypb@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A5
字 数：374 千字
印 张：12.625
印 数：1-8000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040 - 681 - 4/G · 120

定 价：23.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引　　言

如果从族谱上来论证，光武帝刘秀可算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汉景帝刘启的后代。九世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但就现实存在而言，这一时间跨度并不算小，其标志在于亲缘关系至此已淡然若无，因而刘秀虽是皇家宗亲，到他这一代皇家之气已多半只是挂到口头上。家势的衰败已使刘秀的出生、生长和日常生活处于落难状态，皇室色彩基本荡然无存。他九岁时父亲去世，只好投靠叔父刘良，而后返乡参加农业劳动，勤于稼穑，长大后因贩卖粮食去过当时国中的大城市宛城（今河南南阳）。可以说，刘秀身上虽然流淌有皇室的血脉，却生长在下层社会，并未因此而得福荫。然而他却因此而受益，正是因为这种劳动磨难，锻炼和培养了他的意志和品质，培养了他百折不挠的精神。下层社会的生活实践，同时也滋养和激发了他过人的智慧。正由于他的这种生长经历，使他得以在乱世起家，最终成为前类于高祖刘邦，后例于宋祖、明祖的平民或准平民的天地英杰。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易朝，政治腐败，社会管理紊乱，加上连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激起民变，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全国风起云涌。地皇三年（公元22年），看到王莽新朝败象日显，刘秀与一个叫李通的志士密谋在宛起兵未成。为救李通，刘秀提前起义失败，后率部到家乡舂陵（今湖北枣阳南）与本家哥哥刘𬙂的义军会合。是年，刘秀二十八岁。

从公元22年起兵到安定四方，刘秀的生活长期处于军旅状态，不断进行军事斗争。作为一朝开国创业之君，他能够使军队和政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充分表明刘秀不断成长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绿林军拥立汉刘氏远支皇亲刘玄为帝，改年号为更始。此时刘𬙂正率绿林军主力围攻宛城，并派王常率偏师北进警戒，刘秀也汇合到这支军队里。王常军迅速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郾城（今河南郾城）等地，缴获大量粮食牛马，转运到宛城供给主力。绿林军对军事重镇南阳志在必夺的这一态势使王莽政权异常惊恐，遂倾国中之力，派大司马王邑、大司徒王寻带领四十二万（号称百万）大军从洛阳南下，前往镇压，扬言遇城必克，要踏着血迹前歌后舞。由于担当警戒防卫任务，当时固守昆阳的绿林军首当其冲，而包括时任太常偏将军刘秀的七八千人在内的昆阳守军总共只有二三万众。王莽大军临城，形势严峻异常，因而当时军中许多人主张退却。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这种情况，刘秀却为主抗敌，提出坚守昆阳，联络援军，夹击莽军的建议，得到王常赞同。

由于绿林军主力当时攻宛未下，尚在僵持阶段，刘秀自告奋勇，仅率十三骑突围到郾城和定陵联络援军。他召集三千人组成敢死队，并亲率千人冲锋在前。战前，刘秀假意下书昆阳，称“宛下兵到”，故意让莽军捡到，以扰乱莽军军心。起义军冲进敌营，直奔渠帅王寻，将其斩杀。昆阳城内起义军见状乘势出击，对莽军形成夹击之势。王邑大败，又碰上暴风雨，“士率赴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仅率数千人逃回洛阳。“关中闻之震恐，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通鉴纪事本末》卷五光武中兴）。昆阳大捷，不仅创造了我国军事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范例，而且直接促动了王莽政权的垮台，使其自此再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镇压，覆亡在即。这次战役不仅体现了刘秀的英明兵韬，而且表明他具有辩证思维的头脑：他不被敌方的汹汹气势所吓倒，也并不把敌我双方兵力数量看作决定胜负的因素。他既看到了己方数量上的劣势，也看到了正义之师的优势；既看到己方兵力有限，又能透过劣势、超越劣势，看到通过正确的战略战术变敌军的优势为劣势、从而促使形势转化、赢得胜利的可能。在战斗中运用弃书示假的办法动摇莽军军心，表明刘秀谋略丰富，还具有心理战术的智慧。

刘秀政治和军事的韬略还表现在他懂得建立根据地，循序渐进的道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大多犯流寇主义的错误，只知走州过府，东拼西杀，打到哪算哪，比较注重于财货子女的掳掠而不知道建立根据地。刘秀之所以高出同时代政治和军事家，恰恰就在于他懂得先建立和巩固根据地，以保证粮草军需和稳定兵源的供应，再征战远敌。

更始元年十月，更始帝刘玄命刘秀为代理大司马，后来又勉强封他为武信侯，派他到纷乱复杂的河北“镇慰州郡”，实际上给他的是一个苦差事、险差事，而且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仅凭一个“钦差大臣”的名义让他去开创局面。殊不知这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有了官职爵位，刘秀在政治上就有了不小的资本；而摆脱令人愤懑的压制，到河北开辟新领域，对刘秀来说在军事上也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机会。到了河北，刘秀“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通鉴纪事本末》卷五光武中兴），这些政策的实行，受到当地官吏和百姓的热烈拥护。可以说，是清醒的政治头脑、高度的政策水平和过人的胆识，使刘秀很快平定了河北的广大地区。

更始二年（公元 24 年），看到刘秀雄居一方，已迁据长安的更始帝刘玄担心刘秀在河北势大难制，便遣使前往河北，“立刘秀萧王，并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悉还长安”。又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谢躬驻军邯郸，实际上是在遍插亲信，抢夺刘秀的果实。而此时刘秀已决心另立门户，遂“以河北未平，不就征”（《后汉书·光武帝纪》），也即以合法的理由，对刘玄的征召表示了拒绝，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借口的合理掩护下逐步完成反叛准备。他确定了首先在河北肃清刘玄势力，次则渐扫境内各路农民义军，南定河内（汉时漳河以南黄河以北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以邯郸地区为基础，相机进取两京（指洛阳、长安），以成帝业的方针。

更始二年冬，刘秀平定河内郡，任寇恂为河内太守并行将军事，他谋深虑远，对寇恂说：“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当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备他兵，勿令北渡。”定邦之本由是可见。更始三年（公元 25 年），他在高邑称帝，改年号为建武元年，时年三十一

岁。此后又经过一年征战，刘秀肃清了刘玄在河北的势力。与当初刘邦东进北攻建立霸业相比，历史呈现出反向相对的一面。剿灭了割据河北的各路农民军之后，刘秀渡河南进，继而向洛阳进击。

刘秀政治军事韬略的不凡还表现在他懂得运用离间策反之计，破坏敌军，壮大自己。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七月，他开始总攻洛阳。此前还在春天时，攻洛将领冯异已利用城内李轶（李通从弟）在南阳曾与刘秀首谋举事之由，给李轶发信，劝其归附。当时赤眉军主力入关，进攻长安，争夺天下，更始势力日趋败落。而刘秀在河北日益强大，锐不可挡，李轶感到今非昔比，为此心志动摇。当他收到冯异书信后，便给冯异回信。刘秀则深知李轶为人，给冯异复信说：“季文（李轶）多诈，人不能得其要领。”嘱令冯异多加戒备。又将计就计，对洛阳守将展开离间之术——将李轶书信向各守尉宣告，故意让洛阳方面知道，以挑起内变。更始政权洛阳守将朱鲔听说后，果然派人除掉李轶，结果导致洛阳城中人心离散，降者不绝，收到了预想效果。趁此之机，刘秀一面派兵围困洛阳，一面利用部将岑彭曾做过朱鲔的校尉这种关系，派其劝降朱鲔，朱鲔终被说服，率部投降。是年十月十八日，朱鲔迎汉军入城。刘秀随之定都洛阳。

更始帝刘玄被绿林军拥戴，一度占据长安。然而，刘玄志大才疏，不善朝政，苟且偷安，又耽于淫乐，因而始终形不成权威。史书称：“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宾自主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离王，张步起琅琊，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更有甚者，赤眉起义军主力西破函谷，进攻长安，两大起义军集团开始火并。根据这种形势，刘秀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战略，决计待起义军两败俱伤后再行出击。结果赤眉军打败绿林军，自身也受到极大削弱，刘秀来个“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先后派邓禹、冯异两路大军入关，进一步骚扰、打击赤眉军，引其东归。事实果如刘秀所料，由于关中缺粮，经过反复较量，赤眉军饥饿疲劳，势头锐减，眼看长安无法立足，首领樊崇率部归乡，向东撤退。途中受到冯异截击，再受重创。当他们走到宜阳（今洛阳西，洛河中游）时，遇到早已严阵以待的刘秀主力。起义军首领樊崇见部队无力再战，便率部投降。

这一军事策略的胜利，倒是体现了刘秀不打恶仗硬仗，善于利用矛盾和败势，水到渠成促敌自降的智慧。

作为一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创始人和总统帅，刘秀虽然年轻，但他老谋深算，在战争中从不硬打硬拼，而最为善用避实击虚、以逸待劳的战法。在平定河内的战役中，他以少胜多，击败铜马军数十万人，便是采用此策。当时铜马军仗着人多，数次挑战，刘秀一面坚营自守，一面派人断绝铜马军粮道。铜马军困围月余，粮食耗尽，乃夜遁南走。刘秀乘机率兵追击，追至馆陶（今山东），致其大败。

刘秀不仅具有高超的军事谋略，其政治谋略也极为突出，确可以说文韬武略，二者兼备。政治谋略是根本，从一定意义上说，刘秀的政治谋略是他成就大事，决定军事谋略和其他谋略的基础和前提。

首先，他在政治上能够见辱不惊，忍辱不躁，深明韬晦之计。刘𬙂、刘秀兄弟早年起义后汇入刘玄名下，威名日盛，战功卓著，绿林军一些将领由此猜疑忌妒，暗中劝更始帝除掉他们。更始元年五月，刘𬙂等已攻克宛城，刘玄方始称帝。刘𬙂的部将刘稷因对刘𬙂未当上皇帝不满，公开斥骂刘玄，并拒不服从调动。刘玄等抓住刘稷准备惩办，因刘稷有功，又遭到刘𬙂的极力反对，于是刘玄将刘𬙂、刘稷一并处死。消息传到前线，刘秀心中甚惊，但他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从反莽大局出发，十分镇定，审时度势，韬晦屈顺，以图将来发展。他决定只身回宛向刘玄谢罪，以求谅解，并立即从前线赶回宛城。向刘玄请罪后，他既不给刘𬙂服丧，又不表白昆阳战功，更不跟刘𬙂的部下接触，而是不止一次地向更始帝谢罪。更始帝刘玄看他很忠实，觉得不便再加株连，便给他一个破虏大将军之职，实际上却剥夺了他的军权。忍悲谢罪，稳住刘玄，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刘秀政治谋略的一大成功，大有刘邦屈尊项羽，勇赴鸿门宴之智。

王莽在长安被杀不久，绿林军攻克洛阳。更始元年十月，刘玄来到洛阳，随即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进行招降安抚。当时黄河以北有分散活动的农民起义军百万之众，还有不少地方割据势力，需要慎重对待，招慰镇抚。在大司徒刘赐提议下，刘玄决定派刘秀以代理大司马的名义渡河去镇抚河北州郡。接到命令后，刘秀怕刘玄反悔，不及收拾行装便立

即出发。刘玄果然后悔，派人追之，未及而返。这件事也说明刘秀韬晦成功，从此走出困境的智慧。

招降纳叛、宽大俘虏，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也是刘秀常用的政治和军事谋略之一。常言说，人才是兴国之本，刘秀的不凡之处就在于他更重视招募人才，善用人才。高邑称帝后，他召募州中各地王莽时二千石级别的旧吏置于自己幕府，并开诸郡谷仓济贫，使人能赡其父母，养其妻子，以使众望能归。赤眉军攻进长安，更始帝逃奔高陵，他又对此制定了一项宽大政策，下诏说：“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采取这种收买人心的办法，目的也在于争取更始政权的诸多残部投降。不久，朱鲔率部在洛阳举城投降。转年，“更始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降，皆复爵位”。出于同样目的，在平定铜马军时，刘秀对降卒实行宽待政策，降卒心服。由于政策对头，收容大量降卒，使刘秀的军中力量急剧膨胀，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势力。

广施延揽，知人善任，任贤用能，是刘秀作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刘秀用人，善用其长而避其短，能使人才充分发挥优势。

建国后，刘秀更是求贤若渴。他下诏要求公卿“举荐贤良、方正各一人”（《后汉书》兴武帝纪），以保证选贤任能，以德治国。

在封建社会中，是否懂得与民休息、安定社会，是一名君王贤否的标志、明昏的证明，同时也是一个王朝帝祚能否持久的根本所系。而刘秀来自民间，能够体谅下层百姓的痛苦和需求，懂得与民生息、发展生产，安定社会，因而一朝建立政权，便身体力行，勤于治政，急于民瘼。

禁杀奴婢可算作急于民瘼的一个明证。建武二年（公元26年），他颁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诏令中说：“天下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并且，他九次颁诏释放奴婢，禁杀奴婢，使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奴婢问题得到解决，化解了社会矛盾。此外，刘秀还把大量罪徒赦免为民。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国中不少地区发生旱灾、蝗灾，刘秀下诏：“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务进柔良，退贪酷，

各正厥事焉。”奴婢和罪徒的释放，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加社会劳动力，并且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刘秀还大力实行精兵简政，压缩官吏编制，减裁中央直属机构的冗员，并在地方上把小县并成大县。东汉之初，共撤销四百多个县，裁减掉大量县府官吏。在税收上，尽管国家初创，亟待税赋。他却从安民出发，不惜将过去的十之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创历史之最低。建国后，刘秀又大规模裁减军队，安排大批军人回乡务农，留下的军队还要屯田，逐步做到生产自给。上述政策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寓富于民，可谓大刀阔斧的政治举措。

勇于改革、勇于探索也是刘秀政治上的重要特点。作为一朝创业之君，他思想比较解放，不拘旧制，而是根据需要，大胆探索。这首先表现在他推行查田，抑制不平方面。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诏下州郡检核垦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旺不平者”，力图解决贫苦农民无地和豪强霸占土地的问题，敢于对查田不力并贪赃枉法的大官严加惩处。从史料所载“大司徒欧阳歙下狱死”、“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的情况看，刘秀是敢出重拳打击赃官的，也是舍得保护百姓的。然而，在封建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因时代所限，真正落实度田是不可能的。当时“刺史大守多为诈巧，不务核实，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在豪强的操纵下激起了乡民的暴乱，“攻劫在所，害杀长吏”。但总的来看，查田抑不平的效果当时还是显著的。正因为有鉴于种种认识，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和豪强的矛盾之后，刘秀与豪强势力妥协，度田之事不复再提。

改变旧制，加强皇权是刘秀成为一朝新君之后的重要措施。有鉴于西汉晚期大臣权势过重，皇帝丧失政柄的历史教训，刘秀特别注意严加防范。首先，他从制度上压低三公品级，不用功臣外戚。朝中虽保留三公名位，却不授实权。处理政务的尚书台及六曹（相当于六部）则是皇帝的喉舌，“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但尚书令品级，仅为“千石”，相当于大县的县令，尚书仆射（副职）和六曹尚书品级仅为“六百石”，只等于中小县的县官。这样一来，有位的无权，有权的无

位，低官高职，为的就是防止大臣擅权。在具体人选上，刘秀不用开国功臣出任公卿掌管大政，以防擅权，但给他们以高爵重赏，在生活上充分优待，对一般过失也加以宽容。这一恰当的处理避免了西汉初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悲剧的重演，可算是一种安排功臣的成功经验，为后世所效仿。鉴于西汉晚期外戚王氏权势太盛，导致王莽篡位的历史教训，刘秀特别注意对于外戚控制的加强，虽对皇后阴丽华恩宠有加，但对其亲属并不曾委以机密要职。

刘秀注意加强地方权力。譬如在地方行政制度上，他加强了刺史职权，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即十三州，除首都所在地区由司隶校尉兼管外，每州设刺史一人，可直接向皇帝报告情况，而无须经三公及三公审定，这样就有效削弱了三公权力，把管理地方长官的大权收归自己掌握。当然，这样一来也产生负面效果，使刺史威权日重，独断专行，地方与中央逐渐形成了权力矛盾。这一矛盾直到东汉末年才得以解决，后世重改刺史为州牧，品级提高到二千石，并派有名望的九卿出任州牧，才逐渐形成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各司其职，各尽其守。三级地方行政建制的定型和完善，对后世影响深远。

此外，刘秀还注意吸取历史上军阀割据、造反独立的教训，为此裁减地方武官，废除了地方军队。这样一来也削弱了地方军事力量，百姓虽有为国家服兵役的义务，却没有经常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军队素质由此大大削弱，中央军队虽然得到加强，但临时招募的军队缺乏战斗力，一有事变便难以招架。这是刘秀改革不力、或者说不够到位的一面。

刘秀所处的时代，还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封建的经济关系还在积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还是发展中的生产力的代表。当王莽政权激起全国农民武装起义时，刘秀举兵起事，较为广泛地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而当农民起义军内部分裂火并时，刘秀则又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与其说表明了他所具有的二重归属属性，勿宁说或者是种开明君主的应有之姿。其阶级立场姑且不论，就其来自农民，了解民生，体谅下情，宽宏大量，善从谏言，勤于政事，严以修身，尤其是政策开明，统一全国的历史贡献来说，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欢迎，确属自然。刘秀终其一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这是他才德、谋略超人的最好

引言

体现。

常言说，乱世出英雄。作为一朝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刘秀的确是一个能文能武、睿智聪慧的明君，他的韬略智慧当然不是他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在军事战争和治国安邦的实践中激发出来的。后人在欣赏和借鉴他的韬略和智慧的同时，更要学他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碰撞出闪光的智慧，磨炼出过人的才华。

董升 戴克

2002.4.8 郑州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大事往往从不期然中做起 1

经过近十代的宗族繁衍之后，一个所谓的皇室后裔，成为皇族庞大支系的末梢，已经非常接近或者在一定程度上等同、深入于普通的平民；困厄的日子和乡居农耕的风雨，使他无缘感受皇祖的余荫。及至成人后，面对外戚的篡政和当朝政治的窳败，年轻的刘秀在种田、卖粮过程中已身受耳闻，他在等待中思考，在思考中彷徨，最终在彷徨中爆发，走向反叛当朝、中兴汉室的风雨途程。而这，却未必是对皇祖的感恩。

第二章 锯晦之中见精神 29

正由于与一群绿林好汉和豪强为伍，刘秀谦逊、忍让的品德和关键时刻乍露的不凡，才显得弥足珍贵。尽管有着卓群的才识和先行的精神，但在这一时期，他甘于无闻，乐居人后，纵然导演出使腐败王朝倾圮

的一场大捷，也口不言功。当一场突变的风云不期而至之时，他的机警在于，明明知道兄长的被害是猜疑和妒忌所致，却主动请罪，不辩一言，隐光藏锋，在精神的磨炼中等待着转机的到来。其实，韬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是对事业的信心，是对昏庸的轻蔑……

第三章 事业渐大之法 67

在河北，刘秀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名义经磨历劫，镇抚郡县，而后又百般苦辛，消灭了王郎。值此羽翼既丰之时，他却没有听从臣下的话匆忙称帝，而是继续有条不紊地在河北求得发展，进一步壮大实力。在此后的一年里，他灵活运用兵法，从更始政权手中夺得了河内郡，并以河内郡为后方，消灭了活动于河北的十几支义军力量，着实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方始另执义旗，承统汉业。

第四章 处处开花的用兵之则 125

定都洛阳以后，统一国家就成为东汉政权的主要任务，针对更始政权和赤眉军政权这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刘秀采用取胜于易、暂不与争，坐等二虎相争之利的战略。与此同时，他以河内郡及河北为大后方，制定了首先攻取豫州、荆州的战略目标，然后再攻取兖州、徐州、扬州和青州。在统一这几个州的战争中，他的战略方针仍然是坚持不打

硬仗恶仗，重在兵法韬略取胜。

第五章 除叛脱窘之谋 183

东线和南线的统一战争正酣，后方大院却失了火，先是真定王刘扬叛乱自立遭到平定；后是渔阳太守彭宠恃功自大，叛乱称王。此时的刘秀十分冷静，他听从了大臣伏湛的意见，并没有马上派大军征讨，而是明见地预料彭宠不会有太大发展，久后必有内乱。结果，彭宠内部果然生乱，彭宠本人死于非命，叛乱不战而平。

第六章 西线战事见兵韬 211

在取得了关东地区的战争胜利后，全国就只剩下益州和凉州没有统一，刘秀此时本已厌战，声言要暂置益州的公孙述、凉州陇西的隗嚣于度外，但无奈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公孙述却向荆州进攻，隗嚣也联合公孙述拒汉，于是，刘秀不得不继续操戈，通过战争，再接再厉地推进国家的统一。

第七章 经济策，安民策 261

一方面从事统一中国的战争，一方面对已经统一的地区进行德政治理，刘秀所实行的德政主要是表现在他有一个使人民早享太平的本心。为此，他解放奴隶，提高奴隶们

的地位；他释放囚犯，特别是在战争时期，给他们以再生之路；他减轻田租，任用循吏，与民休息，积极推动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统一后，考虑到国中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现实，刘秀以建立一个“八口之家，百亩之田”的社会为理想，为此而对豪强地主来了一个度田政策，增加了国家税赋收入。

第八章 在政治中体现一个“德”字 289

统一中国后，刘秀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以德治国上，他一方面控制外戚的势力，一方面利用文吏，在国中掀起了改革的浪潮：“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是他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变革；“复西京之旧”是他对地方行政体制的变革；在中央和地方厉行监察，澄清吏治，由此一朝政治蔚然如新。

第九章 治吏用人之智 315

治国必然要用人，贤明的君主用人与无道之君自然迥异，则用良吏，即用兴利之吏；也用“酷吏”，即用除害之吏；更用直臣，以听药石之言；刘秀与王莽、与刘玄的不同处不仅于此，而且还在乎他在杜绝外戚擅权的同时，勉励和支持自律性高的外戚。他在治吏用人的过程中始终体现出平和之道，因而与谦逊退让之臣尤为相宜。

第十章 定边御边之谋 341

刘秀一朝的对外关系没有西汉武帝时期那么活跃，而以不受外来力量的压迫为原则。同是南征北战，而比起西汉武帝时期，刘秀的南征北战则多了几分平和，少了几分激烈。同在对外关系上，由于他对外并没有扩张的野心，故而面对西域国家归附的请求，他以天下初定，顾不得外事为由而加以婉拒，实则是因为不愿再兴兵事，免使民困。而根据现有的条件，用和亲的方针笼络匈奴，借以赢得和平发展环境，与民休息。正缘于此，他积极推动边民的归化，以便早日结束战乱，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政治和经济建设上。

第十一章 为君与处世 365

刘秀的为君之道很大程度地体现了他的处世哲学。他一生尊崇经学，以为治国之学；他一生讲求平和待人，从容处事，以求水到渠成之效；他一生尚俭，轻看荣辱富贵，而且优容地面对生死，体现了一朝大国之君的贤明和聪慧。而在与个人、与家庭子女相关的问题上，他自律甚严，从不宽纵。凡此种种，使得他除了迷信图谶等稍见不足的缺憾之外，基本上成为中国历史上作为圆满的封建帝王之一。